

三十三年之夢

〔日〕宮崎滔天 著

佚名 初译 林启彦 改译、注释

花 城 出 版 社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回 忆 录

三十三年之梦

〔日〕宫崎滔天 著
佚 名 初译
林启彦 改译、注释

出 版 社

生活·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三十三年之梦

〔日〕宫崎滔天 著

佚名 初译

林启彦 改译、注释

*

花城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

联合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93 毫米 32 开本 10.5 印张 4 插页 200,000 字

193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11261·1 定价 1.20 元

林启彦先生新译宫崎寅藏 《三十三年之梦》序

章士钊疏《黄帝魂》，对于其中所收的《孙逸仙与白浪滔天之革命谈》一文有以下的说明：“此从吾所编《孙逸仙》一书采摘而来。吾之此书，原以宫崎寅藏之《三十三年落花梦》为张本，……本其一知半解之日文知识，择要选录，成此短书。一时风行天下，人人争看，竟成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黄中黄（章士钊）的《孙逸仙》一书，固是撰者本其一知半解的日文知识，摘译而成，选录既未及半，译文又多出自意度，但如无宫崎的《三十三年之梦》，则亦将无黄中黄的《孙逸仙》，所以清末的这一“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还是脱胎于宫崎的原著。至于章氏所说“有江南名士金松岑，……复取滔天原著，全部精译，踵行于世，”则不尽符事实。因为我们所见到的金一的译本《三十三年落花梦》，也仍只是一种节译之本。论清末的革命宣传，《孙逸仙》一书的流传及其收效之宏，足以和邹容的《革命军》和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比驾。

宫崎的原著是一种自传性的撰述，其难得处乃在其叙事的真实和坦率。宫崎以一个日本所谓的“大陆浪人”，参与清末的中国政治运动，书中对于他个人及其侪辈的思想、生活和行事，他们的在上的指麾者和日本政府的用心和策略，以及他所曾接触的中国人士和所曾参预的在中国的行动，都有

翔实生动的描述。这使此书在了解这时期的中日关系和辛亥革命前的中国革命运动上，提供了部分很值得重视的史料。现在林启彦先生根据香港三联书店旧藏的一份全译稿，与晚近日本学者为该书所作的校订本和注释本对勘，加以整理改译，又成此译本。我侥幸得有机会在今本出版前读了全稿，见到新译译笔的严谨忠实、内容的完足与文字的明白流畅，深为宫崎的原著称庆。也为过去因碍于文字而未窥全豹者能有此好译本而感到高兴。今本有林启彦先生新作的注释和添加的几种附录，其中注释和新编的《宫崎滔天与中国革命编年纪要》，为全书提供有关的历史背景的知识，对读者当尤有助益。

日本明治时期的所谓“大陆浪人”，来自没落的旧武士阶级，行险侥幸，为日本大陆扩张政策的前哨，朝鲜和中国都曾深受其祸。但以其为“江湖壮士”，所以也确有具豪侠之气、急人之急的人出乎其中。如宫崎，为求东亚于西潮的澎湃下得以自存，渴望改变东亚的“旧秩序”，有其一番豪情壮志。清末中国的革命志士，为免陷政府的罗网，多假外国租界、香港和日本等处，以为藏身、宣传、和作起事的准备之地。这样因利乘便，造成了辛亥前中国革命志士和有些日本志士之间的密切的关系。宫崎和孙中山的交谊，也是如此结戚。但宫崎之不同于其多数侪辈的，便是他一旦投身于中国革命，成为孙中山的追随者，便一心为中国的革命效力，至死靡他。在惠州起义失败后，他对自己和对革命前途失望之余，也宁愿投身浪花节卖歌为生，不受图谋不利于中国的日本侵略势力的牢笼。

今本译者林启彦先生是我多年来所敬重的一位年轻学者。他的专长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以戊戌至辛亥的一段时期

为主，而以此时期的中、日两国的思想学术交流为重心。他的专题论文散见于港、日两地的学术性刊物。他编有《孙中山研究日文资料与著作目录》，藏广州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室。除本书外，他还和谭汝谦博士合作，译有日本实藤惠秀教授的巨著《中国人留学日本史》一书，将于明年由北京三联书店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分别在京、港两地出版。

一九八一年仲春

王德昭

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

写在《三十三年之梦》中译本前面

林 启 彦

宫崎滔天（1871—1922）一生的事业，大都与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有密切的关系。他曾长时间地从事于襄助中国革命的活动，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辛亥革命时期的领袖建立了相当深厚的友谊，对中国近代的民主革命事业的进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三十三年之梦》是滔天记述自己前半生事迹的传记。

宫崎滔天，原名寅藏，别号白浪庵滔天，熊本县玉名郡荒尾村人，出身于一个行将破落的武士家庭。父亲长藏精于剑术，为人侠义，鄙薄钱财，不善治产。滔天的豪宕性格多少受到乃父的感染。长兄真乡（八郎）是自由民权运动的健者，一八七七年，因参加西乡隆盛所领导的反明治政府的西南之役而阵亡。一兄（排行第六）民藏，醉心于农民与土地的问题，曾著有《土地均享·人类之大权》一书，主张土地重新分配，反对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二兄（排行第七）弥藏，青年时代即颇留心中国问题，很早就有志于中国的革命事业。这三位兄长对滔天日后思想及志向的形成，关系甚大。青年时代的滔天，曾受业于明治时期著名的欧化派领袖德富苏峰门下，又受过小崎弘道牧师有关基督教教义的陶冶，其后更与流亡日本的瑞典籍虚无主义者阿伯拉罕（Isaak Ben Abra-

ham)交游。虽然滔天后来都离开了他们，但苏峰所宣扬的自由主义，基督教的博爱和平等的人道主义，以及虚无主义的反权力反体制的思想，却对滔天一生的思想与性格的形成有相当深刻的影响。滔天少怀大志，早有淑世之思，对十九世纪后半叶弱肉强食的世界，极其憎厌，而对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宰割世界的野蛮行径，尤表痛恨。目睹当日亚洲国家的衰弱不振、黄种民族的沦亡无日，他曾希望日本能负起挽救之任。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急激的西化政策，使他很失望。于是，他便把复兴亚洲的希望寄托于中国的革命事业之上。从一八九一至一八九六年间，他曾一度赴华，二次渡暹，并在日本国内与朝鲜开化党人金玉均接触。这都是他为了物色志同道合的亚洲志士，以便日后在中国实践抱负所做的准备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在横滨初交孙中山，一见而倾倒拜服，矢志追随。自此以后，他便正式开始了支援中国革命事业的艰苦生涯。

一八九八年戊戌政变发生后，他与平山周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到中国去营救变法派的领袖康有为和梁启超亡命日本。此后，他又尽力谋求孙中山与康、梁之间的政治合作。一九〇〇年，他亲身参与惠州起义的策划工作，为筹措经费与军火，多方奔走。一九〇五年，他又促成了孙中山、黄兴的会面与合作，对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作出过贡献。一九〇六年，他更创办《革命评论》，以文字声援《民报》的革命主张。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后，曾拟赴武汉参加黄兴所领导的革命军。其后又参与筹划上海临时革命政府的成立。入民国后，中日关系日益恶化，身为大陆流人的滔天，固然不易为

中国民众所悦纳；作为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的滔天，却又不容于日本的官宪，时势和环境，都不容许他继续早年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活动。但滔天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同情，却始终不减其热诚。他对袁世凯称帝的图谋，表示愤慨。对第二和第三次革命则寄望甚殷。对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的革命党人，则力为庇护。又在舆论上大力支持南方革命政府对北洋军阀政权的讨伐。滔天确是中国人民在艰难的革命岁月中一个可贵的朋友。

官崎滔天是一个有浓厚浪漫主义情调的人。他情感丰富，但较易冲动。而对中国的革命事业，他亦抱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他认为：“与其得三军，何如获一将”。这种个人英雄主义的作风和想法，影响了他不能耐心地从事艰苦的发动群众的工作。因此，当革命遭受失败和挫折的时候，他便容易陷于沮丧和颓唐的境地。不过，在大关键处，他从不苟且。当中村弥六侵吞了革命党人购械的款项时，他宁冒引起日本政潮大纷争的危险，仍主张犬养毅应对中村施予制裁。当他穷困潦倒之际，日本警察当局曾以金钱诱贿他，想收买他提供孙中山、黄兴和同盟会的机密，但他却大义凛然，报以怒斥。当他自己的家庭尚在饥寒线上挣扎的时候，他还坚持要照顾黄兴托给他的儿子一欧，为中国的革命家抚养后代。袁世凯为了要他支持南北议和，曾以巨大的利权笼络他，他却应道：“渴不饮盗泉之水”。连犬养毅也不得不说：“滔天实在是一个微妙有趣的男儿。外务省本来是派他去调查中国革命的秘密结社的，他却变成了中国革命党的同路人，忘记了自己本来的任务，与孙文意气相投，结为一伙。”（犬养毅《孙文的

回忆》，一九三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东京朝日新闻》，转引自彭泽周《宫崎滔天与中国革命》）

《三十三年之梦》是滔天于惠州起义失败后，在经济极度拮据、心境极度愤怒的情况下写成的前半生经历的回忆录。全书分为二十八节。前半部叙述了滔天自己的家世，早年受教育的经过，他的思想的产生与形成，以及早年在南洋、泰国等地的移民活动。后半部详细记录了他与中国革命活动的关系和经历，主要包括他如何结识孙中山和投身中国的革命运动，到华南去营救康、梁，运武器支援菲律宾的革命志士，促成华南、华中等地会党与孙中山的合作，以及参与策划惠州起义等事件，而以惠州起义失败后，他投身于浪花节界为生一事终结全书。

首先，本书在中国近代史文献中占了一席重要的位置。尤其是本书后半部的叙事，可弥补中国文献对孙中山早年政治思想与革命活动记载的不足。本书及其中译本出现以前，孙中山早年的政治见解及其革命活动，鲜为当时进步的知识分子所知。对于孙中山的人格与学问，中文方面更无专门的材料报道，以致孙文的名字曾引起了多种的误解。经此书的介绍和宣传，孙中山的形象在清末革命知识界中间提高了声誉。这对在孙中山的周围团结革命势力起了重要的作用。由章太炎为本书的第一种译本（章士钊译《孙逸仙》，1908年）作的题词，就可想见。其词曰：

索虏昌狂泯禹绩 有赤帝子断其嗑

掩迹郑洪为民辟 四百兆人视兹册

章氏把孙中山比作刘邦，把他的事业视为郑成功、洪秀全的

延续。这个译本曾列入《荡虏丛书》的一种，成为清末最畅销的革命宣传书册之一，与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等同样风行于中国内外，影响和教育了这一代的革命知识分子。举一个例子来说，黄兴就是因读此书而得知孙中山的思想和事业，莫下了日后与孙中山合作共图革命大业的心理基础。

其次，《三十三年之梦》又是研究近代中日关系的一种材料。孙中山和宫崎滔天结下的革命友谊，除了彼此之间人格作风的互相感召之外，更重要的一点是二人政治理想中有很大部分是相近的。他们都认为亚洲民族要进行独立和民主的革命，才能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被白种人奴役的命运。他们又主张亚洲所有被压迫的民族与国家应该团结起来，互相支援，为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袭，为建立独立的、和平的和民主的亚洲而并肩作战。孙中山和宫崎滔天，作为中日两民族的代表人，曾为此理想而共同奋斗。他们所奉行的亚洲主义，和后来为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滥用和乱用的“大东亚共荣圈”之类，其本质和精神都有所不同。《三十三年之梦》为孙中山和宫崎滔天的亚洲主义的理想及其实践的模式，留下了当时的记录。在《三十三年之梦》中出现的日本人，十之八、九是所谓大陆浪人。其后大多数成为日本军国主义政权蹂躏亚洲的工具。滔天由于革命的需要，或曾因某个时期彼此间的志同道合，曾和他们有过若干的来往和合作。但当最紧要的关头来临时，滔天就毅然与他们决绝。他和董野长知、山田兄弟等始终是中国革命的可靠朋友；而内田良平、头山满之流，则终于成为中国人民所憎厌的敌人。滔天的一生，总是从亚洲民族的利益和中国革命的立场来考虑问题。

所以黑龙会后来要排斥他，日本政府要监视他，打击他。使他连一个县的议员都竞选不上，连政府一个最普通的职位也无法得到。可是，他却在中国革命家和政治领袖中博得普遍的信任和敬重。所以，要研究宫崎滔天的人格与思想，固然不能忽略本书，要了解近代中日关系中友好一面的历史，也应该重视本书。

最后，《三十三年之梦》又不愧为明治传记文学的一种代表作。由于这是滔天早年生涯的实录，而他又毫不隐讳地把自己性格上和行为上的弱点和自己生活周围的大小事情如实地描述出来。因此，这就更能帮助读者认识明治时代青年的精神和心态，以及明治时代若干社会问题，如封建主义教养的崩溃，农村的破产和武士阶层的没落等的实象。吉野作造形容本书文字简洁、描写生动，又指出：“本书最大的历史价值，乃在于它没有虚饰的实实在在的记录。”（吉野作造《〈三十三年之梦〉解说》）

《三十三年之梦》单行本正式出版（1902）的翌年，我国即有章士钊（笔名黄中黄）的摘译本面世，同年又有金天翮（笔名金一）的全译本。前者仅译出了原书关于孙中山的记录的部分，篇幅上不及全书的五分之一。后者虽是全译本，其实仍不过是粗略地拣译而已，错译、漏译、乱译的地方，随处可见。民国以后，虽曾出现过几种译者名称不同的译本，但其实都不过是金译本的改头换面而已。六、七十年间，竟无一部完整而忠实的译本，实为遗憾。

香港三联书店原藏有《三十三年之梦》的旧译稿，所根据的版本是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东京文艺春秋社出版的一种。该书出版时，由于政治因素和社会条件所限，曾对原书做了相当大幅度的删节、讳饰和改动，使原书的本来面貌受到很大的破坏。至于译文方面，这译稿又似乎是一份集体合译的初稿，叙事、译名、遣词、用字等均未经最后的修订工作，而错译之处亦复不少。为使本书能有一个较佳的译本，笔者遂以此旧译稿为基础，对照了小野川秀美、宫崎龙介合编的《宫崎滔天全集》（东京，平凡社，1976年）第一卷所收《三十三年之梦》的最新校订本，重新加以订正和补译。并且在必要之处加上译注，使读者对书中所叙的人和事有较深入的认识。这些译注主要是参考了岛田虔次的《〈三十三年之梦〉注释》（《宫崎滔天全集》第五卷所收）和宫崎龙介、卫藤藩吉校注的《三十三年之梦》（东京，平凡社，1967）书末所附的《人物略传》和《注》，剪裁修订而作成的；间中亦有笔者个人查考所得，是否有当，仍希各方专家前辈赐正。书后的附录选载了吉野作造《〈三十三年之梦〉解说》，宫崎龙介《先父滔天的一些事迹》和笔者所编的《宫崎滔天与中国革命编年纪要》等数篇文献，希望有助于读者更进一步理解《三十三年之梦》的历史价值，以及宫崎滔天的为人和他与中国革命的关系。

一九八〇年五月初稿

出版说明

官崎滔天(1871—19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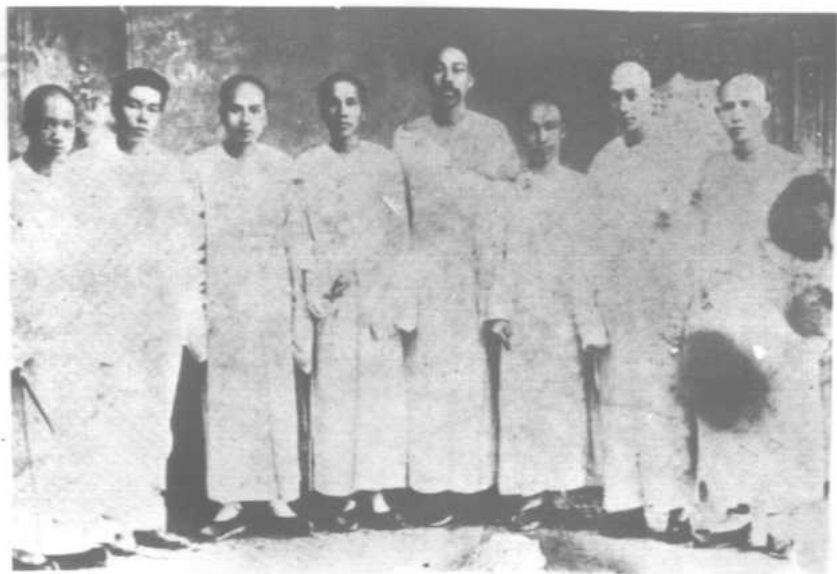
热心襄助中国民主革命运动，与孙中山、黄兴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对我国民主革命事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

本书是他生前写下的一本回忆录，反映了他的思想性格的形成、发展，以及结识孙中山，营救康、梁，参与策划惠州起义等活动的经过；同时，也较坦率地写出了他思想、生活方面的某些弱点。

我们出版此书，为探讨近代中日关系史，为研究孙中山早年的革命活动，提供一份较为具体的材料。



撰写《三十三年之梦》时的宫崎滔天



官崎滔天与兴中会会员合照（一八九九年·香港）



辛亥革命爆发，官崎滔天与革命同志迎孙中山归国时
摄于香港某轮（一九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官崎先生

推心置腹

孫文

孙中山给官崎滔天的题字



官崎滔天一家